第一篇　重大事件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和标志，历来为研究者所特别关注，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卢沟桥事变研究概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和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卢沟桥事变的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有关卢沟桥事变史料的陆续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

（一）史料方面

迄今为止，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史料已得到较好的整理，并被陆续整理出版，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目前，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主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日]古屋奎二编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日]今井武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秦德纯回忆录》（秦德纯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中华民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交史料汇编》第九册（1937—1938）（陈志奇编，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6 年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四编一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台北 1965 年版）;《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中共中央党校党史资料室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6 年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罗家伦编，载《革命文献》第 106、107 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 1984 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彭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三卷（政治）上、第四卷（外交）上（章伯锋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历史档案》 1985 年第 1 期，《民国档案》 1987 年第 1、2、4 期和 1995 年第 2 期、1996 年第 1 期均刊载有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档案。此外，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卢沟桥事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著述方面

在大批史料出版的基础上，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专著也出版了多种。主要有：《卢沟桥事变》（杨叶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卢沟桥事变纪事》（王冷斋著，北京时事出版社 1987 年版）①；《卢沟桥事变》（杨继编写，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卢沟桥事变风云篇》（武月星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 兼与日本有关历史学者商榷》（曲家源编，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版）;《卢沟桥事变前后》（沈继英、柳成昌著，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卢沟桥事变史论》（曲家源、白照芹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马仲廉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年版）；《七七事变》（胡德坤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② （李惠兰、明道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①作者王冷斋为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可以说，此书既是一本专著，也是一本史料书。

②此书常识性的错误甚多，林治波有专文予以指正。见林治波《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抗日战争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版);《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1927—1937 年中日关系》(袁成亮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著,广西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浴血卢沟桥》(张宗平著,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李云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卢沟桥事变》(李云汉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此外,在有关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军事史的著作及相关的人物传记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卢沟桥事变。这方面的著作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仅介绍比较重要的几种,如:《抗日战史》(张其昀著,台北国防研究院 1966 年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3 年版);《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蒋纬国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8年版);《抗日战争史稿》(龚古今、唐培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新、陈铁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王桧林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三)论文方面

学界对卢沟桥事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有几百篇之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蔡德金的《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 年第 3 期),李华兴、杨宏雨的《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 年第 3 期),杨立强的《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等。

(四)学术讨论会

关于卢沟桥事变,学界举办过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如,1997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史学会、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举办了“纪念七七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 年 8 月 14 日至 15 日,为纪念七七事变 65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又联合举办了“七七事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 70 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60 篇。此外,在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

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卢沟桥事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也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二、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及背景

(一)卢沟桥事变的起因

在有关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中日两国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右翼分子，以所谓“第一枪”问题，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不承认卢沟桥事变是日军的预谋。说事件之火“是在从没有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地点燃的”①，“完全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② 1987年12月，秦郁彦在日本《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一篇《现场营长公开了宝贵证词》的文章，不仅强词夺理，称卢沟桥事变是中方“非法射击”所致，而且竟然声称：“对于（日本）中国驻屯军来说，如果中国方面爽快地承认‘非法射击’的责任在于基层士兵，并且由负责人出面道歉和移防的话，是准备就此了结的。”“因而，如果第二十九军的反映和行动再稍慎重和适当一些，就不至于发生卢沟桥事件，即使发生了也可作局部纷争而解决。”

针对日本一些学者的“偶发论”观点，中国学者引据大量史实进行驳斥，指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不仅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的，而且这种预谋性有其深刻的根源。③ 理由是：1.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奉行军阀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日本有些学者与中国学者达成了共识，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上，“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究其原因，与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他们大肆扩军备战，以对外侵略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正是这种“最高目标”的特殊要求。 2.“大陆政策”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①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② 服部卓四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版，第13页。

③ 庄明坤等：《“卢沟桥事变”起因浅析》，《江海学刊》1987年第5期。

精心炮制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部；第五步征服全世界。1927年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奉折》中公然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方针，主张对中国的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即武力征服的手段。根据这个侵略计划，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最后又很快挑起卢沟桥事变。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提出、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即是不断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扩张、战争升级的过程，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大陆政策”，才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 3.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企图摆脱经济、政治危机和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的需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继续采取扩军备战政策，片面发展军需工业，致使日本民用工业生产大大减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解决庞大的军事预算、筹措扩大军事工业的足够资金，发行公债指数不断增加，致使日本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国内阶级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和激化。为摆脱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日本迫切需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和斗争目标。由上可见，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策划的。

蔡德金在考察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经过及日本军政当局的举措两方面后，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完全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所谓“第一枪”的问题，不过是为挑起战争制造借口，为其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论据。①

张守刚、张生则运用博弈论模型对卢沟桥事变从一个“地方性”事件演变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伊始，中日两国都不同程度地想避免卷入全面战争，但是由于双方在卢沟桥事变后所采取的对策使得他们陷入了“谁是懦夫”的困境中，最终导致了全面战争的爆发。②

（二）卢沟桥事变的背景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背景问题，史学界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分别作了探讨。

在经济背景方面，有学者深入研究了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以及经济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事变前，日本对华北

①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②张守刚、张生：《博弈论视角下的卢沟桥事变》，《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经济侵略不仅有掠夺资源、扩充军备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动机，而且包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略上的考虑。”① 其理由：1.从日本在华北的投资看。1931 年以前，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投资重点转向华北。到 1936 年底，日本在华北投资已占对华投资总额的 43.5%。由于投资激增，华北逐渐成为日本所谓的“特殊利益地区”，其战略地位明显增强。2.从日本侵华的意图看。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华北成为它的主要侵略目标。为使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策动汉奸推行了“华北自治运动”，于是打出了“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旗号。

在政治背景方面，过去一般认为：蒋介石政府顽固执行‘攘外安内’政策，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造成中国抗日力量内耗、国防空虚，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可乘之机。”② 其理由：1.“安内攘外”造成东北沦陷、华北兵力空虚，使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2.“安内攘外”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扩军备战时间，做好了侵华战争的准备；3.“安内攘外”使日本得以掠夺东北及华北，弥补了国内资源缺乏的弱点，加速了经济军事实力增长；4.“安内攘外”使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内耗，扩大了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差距。

近年来，学术界基本上改变了看法，认为从 1935 年开始，蒋介石逐渐改变了对日妥协态度，开始进行抗日准备。李华兴、杨宏雨指出，从 1935 年开始，蒋介石对日日趋强硬。③ 理由是：在外交方面，1935 年 10 月，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重申中国提出的三原则。蒋作宾奉命提出的三原则，标志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重要转变。此后，中国政府以此三原则与日本广田三原则相对抗，强调这是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先决条件。1935 年 10 月，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会谈中，中日双方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在日方不对中国让步的情况下，11 月，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11 月 20 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936 年 7 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

① 王同起：《‘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 年第 3 期。

② 赵三军等：《安内攘外与‘七·七事变’》，《河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③ 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 年第 3 期。

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一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 11 月，绥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并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军事方面，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抗战准备工作，包括成立国防最高机构——国防会议（1936 年 7 月）和国防委员会（1937 年 3 月），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定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实行征兵制，推行国民军训。经济方面，国民政府还确立了配合国防建设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 1935 年 4 月，成立了从事国家资源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的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当年，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并从 1936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设起 21 家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设主要从国防考虑，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青海、云南等省。同时，国民政府对交通建设也十分重视，截至 1937 年上半年，中国已建成铁路 13000 公里，公路 109500 公里。国民政府在战前的这些准备工作，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学通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 1932 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 1938 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 1935 年 4 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稀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概全。①

①李学通：《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1 期。

二、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关节点”

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关节点”，即卢沟桥事变是否为中国抗战的起点以及中国时局的转折点两个问题，引起人们的争论。

（一）关于卢沟桥事变是否是中国抗战的起点问题

在起点问题上，史学界经过长期争论，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①] 根据是：1.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并未拟定出具体的、完整的、全面的侵华计划，日本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及是否扩大侵华仍存有严重分歧。而卢沟桥事变前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事变前，从日本驻屯军兵力扩充及演习情况、日本的“国策原则”以及“1937 年度的用兵纲要”上看，都出现了全面侵华的倾向；事变后，日本中央统帅部立即作出向中国大量增兵的计划，并全面调整日军战争序列，进行作战部署。由此表明，日本全面侵华已经开始。2.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发生事实上的本质改变。事变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是几方面的交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阶级对立而未真正实现。卢沟桥事变则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和中国人民的抵抗，已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内容。 3 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率先通电全国，号召人民、政府与军队紧密团结，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蒋介石也于 17 日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抗日。这标志中国人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不是卢沟桥事变，而是九一八事变。[②] 这是近年来出现的并已为较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其理由是： 1.从日本方面看，早在 1927 年“田中奏折”中就表明了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日本用武力霸占中国东北以及后来相继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等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升级，而不是开始。2.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看，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国民党政府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但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

① 董令仪：《卢沟桥抗战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开端》，《山东师大学报》 1987 年第 4 期。

② 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 1989年第 2期。

人民的抗日斗争却自发地开展起来，并从未停止。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意愿、态度、政策如何，中国人民已掀起了全面抗战。 3. 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看，九一八事变“使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独吞中国的阴谋付诸行动，改变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均衡，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大变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可以是卢沟桥事变，也可以是九一八事变，即前两种观点可以并存。① 理由是：1.作为专史，从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着眼，抗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便一直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延续的时间是 14年。2. 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特定时期的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的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则应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共 8年，俗称‘八年抗日战争”。

（二）卢沟桥事变是否是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在转折点这个问题上，史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卢沟桥事变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局部抵抗到全面抗战的重大历史转折，因而成为“时局的转折点”。② 理由是：1.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不准人民“妄言抗日”；共产党虽然坚决主张抗日，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没有能够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2.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和平谈判，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从自发和局部的抵抗转向全面抗战的可能，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则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大力声援、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卢沟桥和平津，奋勇抗战。随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从而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使中国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李华兴、杨宏雨也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③。原因是：1.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2 卢沟桥事变是国民政府从不抵抗政策到奋起抗战，从有限妥协到走上抗战建国的道路的转折。3.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

①王桧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史学史研究》 1991年第 2期。
②刘道华：《“七·七”抗战的历史意义》，《天津师大学报》 1987年第 3期。
③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 历史的转折点》，《史林》 1997年第 3期。

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4.卢沟桥事变是中国人民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总动员的转折。5.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由危亡到振兴、由黑暗到光明的转折点。

另一种意见，卢沟桥事变不是“时局转折点”。他们提出“日本对华北的进攻并没有打痛和逼急以江浙一带作为统治中心的国民党当局，国民党仍不肯放弃反共国策，仍指望日本不扩大战争，对苟且偏安仍抱有幻想。直到日军悍然把战火烧到上海，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时，蒋介石集团才抛弃幻想，决心同中共合作，一致对外”。因而主张时局转折点应为八一三事变。① 理由是：1.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虽然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但直到八一三事变前，双方终未达成协议。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看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无法避免，动员包括红军在内的全国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已刻不容缓，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改变。正是在八一三事变的促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2.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开始一致对外，抗日救亡浪潮席卷全国，这种团结御侮的局面使原先严重阻碍中共及其军队发展的主要障碍消失了，这为敌后抗日战场的开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基本条件。

除上述两个“关节点”问题外，还有学者提出卢沟桥事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②。理由是：1.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征服中国、占领东亚、争霸世界战略行动的第一步，它的爆发完全改变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使法西斯侵略战争揭幕。因此，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战争绝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世界总格局的重大事变。一方面，日、德、意轴心国紧急地结成了法西斯同盟，使三个战争策源地联成一个整体，发动了世界性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使东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与西方反抗德、意法西斯的战场形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统一体，有机地组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则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卢沟桥事变理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三、关于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外关系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论述颇丰。中德、中美、中苏、中英、中意

① 白杰：《论“八·一三”事变是时局转折点》，《争鸣》1993年第4期。

② 石林：《“七·七”抗战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等关系均有论及。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事变前后中国与德、美、苏三国关系为例，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事变前后的中德关系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友好”到破裂的过程。曾巍等人指出，事变前，特别是30年代，中德间建立了与其他列强不可比拟的外交关系，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并于1936年达到一个高潮，尽管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利益需要的“友好”关系在上升时期就因为“陈济棠问题”、“伪满洲国问题”，尤其是由于“德日结盟问题”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并没有使双方合作关系受到太大的影响，两国仍保持密切的往来。直到中德关系发展中介入了新的因素，即日本全面侵华方针已定，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德国的对华政策才逐渐发生转变。①

关于转变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德国是一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曾巍也认为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希特勒就开始酝酿改变对华政策，特别是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更坚定了其对华政策的转变。从此，中德关系一步步倒退。②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王建朗指出，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为维护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日中间保持了一种“中立”的态度。③ 在中日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德国还一直希望中日能谈判解决争端，为此策划陶斯曼调停。梁星亮等人则指出，抗战初期，德国不仅没支持日本侵华，相反采取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政策。事变发生后，德在“震惊之余”，先是附和英、美等国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继而以日本违反《反共产国际协定》为由，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因此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同时在行动上继续向中国输出大量军火和顾问人员，支持中国抗战。④

一些研究者还对中德关系发展由“友好”到破裂这一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方世敏提出了转变的两点理由：一是国民政府对纳粹德国本质认识和政策估计出现严重偏差。国民政府单纯地认为中、德同受帝国主义的束缚，是“患难伙伴”，忽视了中、德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基础，因而对德抱有幻想，企图与德结盟，以致在中、德关系处理中一直处于被动地

①② 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

③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梁星亮：《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位。二是纳粹德国在全球战略中的远东政策，决定了它在中、日间作出抉择时必然抛弃中国。德国法西斯本性决定了它在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中特别需要日本这个对一战后世界格局不满的强国的支持。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虽对德国扩军备战有一定经济意义，但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德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是无法同日本相比拟的。① 曾巍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德关系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德国实行的是无长远目标的实利主义投机性外交政策，因而对华政策不稳定且无信用，加上蒋介石国民政府推行亲英、美的外交政策，忽视与德国关系的发展②，这些都是决定德国在中、日间取舍的因素。

（二）事变前后的中美关系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在事变前后没有质的飞跃，变化不大。事变发生前，尽管南京政府形成并确立了以英美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对华侵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奉行所谓的“独立国际主义”和非军事干涉政策，对蒋政府反应冷淡，中美关系处于低潮 ③ 事变发生后，美国不仅仍执行“不干涉政策”，而且依据所谓“中立”法案，向日本大量销售战略物资，实际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④

研究者还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侧重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调整，即以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并于 1938 年逐步完成了这一转变。⑤ 但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发生改变，目前史学界有一定分歧。张圻福指出，事变爆发后，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引起了美国朝野重视，但丝毫没有改变华盛顿当局的远东政策，美政府继续执行所谓“不卷入战争，又使战争不致扩大和延长”的理想主义外交路线。罗斯福甚至为避免与日本发生摩擦，发表了“9.14声明”，助长了日军的对华侵略。⑥ 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卢沟桥事变后，美对华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对事变的最初反

①方世敏：《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走向述评》，《湘潭大学学报》 1993年第3期。

② 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 1992年第 4期。

③张圻福：《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安徽史学》 1995年第 2期。

④胡大泽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看它在抗战前后的对华政策》，《青海社会科学》 1991年第 5期。

⑤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 1995年第 4期。

⑥ 朱坤泉：《论抗战之初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苏州大学学报》 1992年第 2期。

应是宣布对中国不援引中立法，暗示中国政府可以从美国购买运进战争物资；他还预见了美、日难免一战，因此美国务卿史汀生等人主张对日实行禁运；罗斯福甚至构想中国成为美地面部队的作战基地，进而使中国能打败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取代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的盟友；此后罗斯福发表了“防疫演说”，暗示美国将采取行动；接着罗斯福还试图敦促国联通过谴责日本侵华公报。① 尽管这些举措因美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未实施，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对华政策已有所松动，从而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华政策全面调整打下了基础。

（三）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在大的方向上史学界已取得一致，都认为事变前后，苏联均实行了援华政策，国民政府也在事变发生后实现了由“防苏”向“联苏”外交方针的调整。② 但在中苏关系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史学界出现了如下争议：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的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是条约的受惠国，条约对苏联却没有多大意义。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指出，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首先是苏联主动提出要在中、苏间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在事变爆发前两年中苏间就开始了有关谈判，之所以未能形成共同意见，是因为国民政府对苏动机还持有疑虑；其次，中苏签约有附加条件，中国必须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样也就最终打破了日本联华制苏的幻想；此外，中苏签订的是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互助条约，这样就使苏联避免了直接卷入战争的危险，又可以援助中国抗战，由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③

关于苏联援华的性质。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认为苏联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一种是全盘肯定，认为苏联完全实行国际主义，是无私的。近年来研究成果已逐渐发生变化。王真指出，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应将初期和后期加以区别，他认为，在抗战初期苏

①胡大泽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看它在抗战前后的对华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②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③李鸿文：《卢沟桥事变、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联援华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其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的，是国际主义。① 但也有学者指出，尽管抗战初期苏联政府全力支持中国抗战，并及时提供大量援助，但对华政策中的利己主义倾向也有所表现，例如苏联支持中国抗战是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基本出发点的。② 还有些研究者认为，苏联在推行援华政策时，出于其远东战略的考虑，并未尽其所能，全力援华，而是有限度的，有利己主义的一面，其表现是： 1.既有效支持中国抗战，又不导致苏联单独卷入战争；2 援华不能影响苏联军备建设；3.援华不能导致日本过分紧张。刘志青认为，苏对中国的援助是有偿的，一方面贷款有利息，另一方面，偿还贷款的物资大都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品，这对中国是有害的。③

李鸿文对苏联援华政策性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认为，苏联对待中国关内和东北抗战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苏联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抗战，并积极援华，这与其在九一八后对日本侵略东北所持的“中立主义”或“不干涉主义”态度相比，有一个重大改变，这也正是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苏联对东北地区抗战态度却存在二重性，有支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继续保持所谓的“中立主义”立场，甚至公然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以适应日本的侵略要求，充分表现了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④

四、关于卢沟桥事变中有关人物、机构的研究

(一)蒋介石与卢沟桥事变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和大量档案史料的开放，学术界关于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时的对日政策的评价，在相当程度上已改变了那种认为蒋介石“时时幻想把卢沟桥事变当作地方性事件来解决，要冀察当局与日寇谈判，并以双方同时撤兵为条件，准备对日妥协”，直至日军进攻上海，

①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②朱敏彦：《试评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民国档案》 1990 年第 4 期。

③刘志青：《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第 2 期。

④李鸿文：《卢沟桥事变、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东师大学报》1994 年第 2 期。

使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时，“才不得不采取比较积极的抗日行动”① 的传统观点，对蒋介石作了较多的肯定，如肯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立即下了抵抗的决心，“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准备抗战”。但是，有人认为，蒋介石并未放弃与日本妥协的思想，即在备战的同时，“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采取了“谈判”与“备战”并重的双重方针。② 持此观点者认为，一方面蒋介石对事变的解决，仍抱有很大的‘和平愿望”,以‘不求战”,‘不挑战’来保留对日谈判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与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时不同，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提出了“应战”和“必抗战”的口号，这还是第一次，说明了他此时已有抗日的打算。此外，他在实际行动中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抗战的积极准备，例如他一面督促宋哲元等“固守勿退”，另一方面又调兵北上支援二十九军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下了抗日决心并具体组织领导抗战，没有经历一个在“谈判”与“备战”间游移不定的过程。曾景忠指出，不主动求战，但决心应战，是蒋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 7月 8日蒋给宋电报及其后致第二十九军的数封电报，都表明了蒋抗日的决心。蒋还在派兵援宋的同时“对全国抗战及时作出了各种安排”。③ 此外，在政治宣传、外交方面，蒋对日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④ 这都表明蒋已开始组织领导抗战。

第三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虽采取了和战两手的方针，但重心在于备战，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和，也要以不丧失领土主权为条件，这与他在九一八事变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⑤。原因在于：

①龚古今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5、79 页。

② 杨圣清、何仲山：《试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6 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 页。

③曾景忠：《关于抗战的起点问题》，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 1990年版，第 50 页。

④肖绿：《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及对策》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第 211、215 页。

⑤罗平汉：《蒋介石、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态度比较》,《山东社会科学》 1997年第 6期。

(1)蒋介石此时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2)日本人堵死了蒋介石求和之路。(3)日本一面拒绝同南京政府直接交涉，一面却与冀察地方当局签订现地协定，蒋介石担心冀察当局背着中央政府，同日本和平妥协，使华北变成冀东第二。(4)更重要的，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导致东北沦丧，华北危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认为，“安内”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因为中国共产党早已表示可以与他合作抗日，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拥戴他为全国抗战领袖。面对日本的进逼，摆在蒋面前的，要么抗日，要么再度妥协退让。而采取后者，不仅中共和全国人民会反对他，地方实力派也会反对他，就是他的嫡系中要求抗日的将领也不会同意他这样做。如果再度妥协退让，只会导致众叛亲离，是环境和形势逼他在和与战的选择中，重在作战之准备。

以往研究者多从客观上考察促成蒋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曹德贵则从主观因素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蒋所具有的民族意识是他转变政策的主观因素，“蒋尚有民族情绪，蒋能抗战”。蒋多次提到的“最后关头”便是其政策转变的临界点。“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冲破了最后关头的界限，蒋不甘心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自己作日本的傀儡，再加上他内心深处以中华民族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使他无法接受臣服“倭寇小邦”的事实。这种民族意识的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其对日政策由妥协转向对抗。①

（二）宋哲元与卢沟桥事变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热衷于“和平谈判”，疏于军事准备，幻想以局部妥协谋求苟安，结果一再错过有利战机，最终造成了平津失陷的失败结局。如蔡德金认为，宋哲元与冀察当局主要负责人秦德纯、张自忠等人，一直对事变抱有和平幻想，热衷与日军间的交涉。作为冀察当局主要负责人的宋哲元，在事变发生后，本应根据南京中央的指令前往保定指挥一切，以防万一，但宋却滞留乐陵，这本身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宋非但不遵令前往保定，相反却往天津，正好中了日方要将宋哲元绑架到天津的计谋。由于宋哲元的和平幻想，他不仅使二十九军

①曹德贵：《蒋介石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疏于防范而且阻止中央军北上，使中央军未能实现预定的部署。相反，却使日本赢得了派兵华北的时间。当 26 日松井发出最后通牒后，宋虽于 27 日发表《自卫守土通电》，但为时已晚，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二十九军遭受巨大损失，北平、天津迅即失陷。对此，宋哲元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

宋哲元等人为何在日军步步紧逼，大战在即的形势下，仍要不遗余力地与日方交涉，并以一再满足日军的要求为代价？传统观点认为，宋是根据蒋的“意旨”与日谈判的，是由于二十九军内部有战与和两派分歧，宋受到主和派的影响②，是由于宋到天津后，难免受亲日分子齐燮元、张允荣、刘冶洲、陈觉生之流的影响，而不得不作出的决定。其交涉的目的在 16 日以前是否仍系与日方“虚与委蛇”。

蔡德金则认为，1.宋哲元不是根据蒋的“意旨”与日谈判的。他不仅是违背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而且是背着蒋介石与日方秘密进行的，在 21 日以前，对于与日方达成的协议，始终不向中央直接呈报。 2.宋哲元与日方的交涉也不是受主和派的影响，诚然，在冀察委员会内部有着以齐燮元、张允荣、陈觉生为代表的亲日分子，且有不小的影响，但这些根本不可能左右宋哲元。不论是秦德纯等人在北平的交涉，抑或宋到天津后与日本的交涉，都是奉宋之指令和由其直接处置的。 3.宋哲元与日方的交涉的原因在于他存在和平幻想。宋哲元的和平幻想既是受了日方所宣称的坚持“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的影响，中了日本的缓兵之计，又是中了日本挑拨其与南京中央的离间之计。 4.作为地方实力派，宋哲元特别惧怕蒋介石所推行的排斥异己的政策，与南京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离心离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害怕由于事态扩大中央军乘机北上，中央势力重返冀察与平津。这正如日本驻北平参事官森岛所分析的，他说，宋与冀察方面一般说来害怕与日军冲突；中央军如果乘机北上，不仅增加了与日军冲突的危险性，也担心自己的地盘最终被中央所夺。因此，在努力阻止中央军的同时，也努力谋求与日本方面妥协。③

荣维木则认为：首先，宋对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目的认识不足。宋自主政华北以来，对日军进攻并非全无防范，但是对于卢沟桥事变乃是日本大举进攻华北和中国开端的严重性，宋却丝毫没有认识到，仍企图大事化小，

① ③ 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 1997年第 3期。

②见荣维木：《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 1992年第 3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